

唐 嘉 弘 主 編



矢 秦 史 論 集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先秦史論集



先秦史论集

——徐中舒教授九十诞辰纪念论文集

唐嘉弘 主编

一九八九年七月廿四日
收到 家 和

中 州 古 籍 出 版 社

先秦史论纂（黄河文明丛书）

主 编：唐嘉弘

责任编辑：贾传棠

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郑州市花园路54号楼）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河南开封胶印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 14印张 1插页 34.5千字

1989年4月第1版 1989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册

ISBN7—5348—0233—4/K64

定价：8.00元



徐中舒先生(中) 唐嘉弘先生(左) 伍仕谦先生(右)

徐中舒教授九十诞辰纪念论文集

唐嘉弘 主编

中国先秦史学会
河南大学先秦文化研究中心 编

先秦史论集

徐中舒教授九十诞辰纪念论文集

目 录

徐中舒先生对学术、教育的贡献

——为其九十诞辰而作……………吴天堉（1）

徐中舒先生与四川的文物考古事业

——为庆祝先生九十寿辰而作……………沈仲常（30）

著名学者 晶莹寿星

——献给徐中舒先生九十华诞……………夏子贤（37）

西周诸王年代考……………赵光贤（44）

三朝制新探……………刘家和（63）

先秦史概论……………唐嘉弘（81）

“国人”新解……………徐亮工（103）

试论周代的军旅组织……………汤雄平（130）

论西周国家结构与共主政体……………彭邦本（144）

青川木牍简论……………徐中舒 伍士谦（158）

由亚冥天铭文推论燕殷文化……………靳维至（168）

仰韶文化是中国文明的源头·····	陈昌远 (180)
由两周腰器论及《宋孟姬匜》·····	王子超 (200)
论仰韶文化的家庭形态·····	李玉洁 黄有汉 (209)
论红山文化非先商文化·····	郑伯昂 (221)

论西周的卿大夫与采田·····	吴 泽 李朝远 (237)
晋国作爰田的内容和性质·····	周自强 (256)
论周代的农村公社·····	李 豫 (272)
西周春秋家长制家庭公社质疑·····	段志洪 (284)
《奴隶社会并非人类历史发展必经阶段研究》前言	张广志 (303)
商代田猎与军事训练的关系·····	孟世凯 (309)
释“茹毛饮血”·····	冯庆余 (320)
论先秦崖居遗俗·····	黎小龙 (327)

春秋“百濮”地望考辨·····	石 泉 (337)
吴越的崛起和对长江下游的开发·····	吴浩坤 (350)
密须国初探·····	李仲立 刘得祯 (367)

释“勿”

——“格物”新诂·····	杨向奎 (378)
论中国古代太阳崇拜·····	杨希枚 (385)
论早期儒家的战争观念·····	吕绍纲 (394)
论公孙龙辩学的创新精神·····	刘宝才 (409)
关于今本《尹文子》·····	牟本江 (420)

关于古代鹰猎的一则札记·····	闻 宥 (428)
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研究述评·····	曹树森 (432)

徐中舒先生对学术、教育的贡献

——为其九十诞辰而作

吴天埤

徐中舒先生生于清光绪二十四年戊戌九月初一日，即公元一八九八年十月十五日。迄今已达九十周岁的高龄。他从事教育工作和在四川大学历史系任教，分别是七十和五十年以上。在这漫长的岁月中，他以高尚的情操，自强不息的精神，研究学术、教育青年，做出了辉煌的成绩。现就浅识所知，略陈梗概，用表景仰。

一、生平述略

徐中舒先生，安徽省怀宁县（今安庆市）人。初名道咸，后以字行，称中舒。上代务农，世居安庆城西北盛唐山下的月形山，族人聚居，其地又名徐家坂。这里曾是太平军陈玉成和湘军曾国荃两部进行激战的地方，破坏严重，一片荒墟。先生的祖父徐振庆，生当其时，家境困难，和江南逃荒来的一个妇女结婚，生有三子，长子徐家文，就是先生的父亲。为了谋生，徐家文学了木工。家文资性敏慧，练就了一手精湛的雕花技艺，很得乡里称道。当时鸦片烟毒弥漫社会，家文不幸染上恶习，处境潦倒，后来流徙到大通为人修建房屋，竟致摔死了。

给徐先生一生影响最大的是他的母亲。母亲姓金，外祖父以教书为业，子女众多，生计窘迫，又有些迷信，对于他的这个生

于光绪四年的女儿，岁次属虎，又在五月，认为不吉利，生下三天就舍给了徐家。由先生的祖母接受养育，爱如己出，后来成为童养媳。她十九岁与家文结婚，比丈夫小十二岁。两年后，诞生徐先生。先生方三岁，祖父、父亲相续逝世。先生自述当时的境况说：“时家无儋石之储，两叔业已异居，自给不暇。吾母椎心泣血，以死自矢。”徐母走投无路，只身带着孤儿进了安庆新设立的慈善救济机构清节堂。清节堂有选择地收容寡妇孤幼，由地方推举士绅管理，因主持得人，效果尚好。堂内附设义学，后改育正小学，不特方便了堂内孤儿的学习，由于师资优秀，教学认真，社会人士亦乐送子弟就学，先后培养了不少的人才。清节堂还设了织布厂，让受救济的妇女学得生产技能，补助收益，改善生活。徐母没有读过书，却很有志气，通达事理。公元1902年她带着五岁的儿子进入清节堂，从此以惊人的毅力，日日夜夜孜孜不息的劳作，一心一意要把儿子抚育成人。她在清节堂整整度过了二十多年。先生是七岁进育正小学开始读书的，这段“备极人世之凄凉”的生活，给先生的印象极为深刻，中年还记忆犹新。他在《先妣事略》中说：

每日辨色而兴，则使不肖起，不肖东行入学，则吾母西行入织。及薄暮，不肖归自学，则吾母归自织。入夜则一灯荧然。凡日间未竟之事，如不肖母子衣服缝治与浣濯，皆于此时为之。往往刀剪声与碓杵声相杂下。或至凌晨，鸡鸣，入息片时即兴。吾母织作之勤，恒倍他人，每当盛暑，汗出如沈，机旁恒置水一盆、巾一方，汗下则出巾自拭，闲时绞之，则若小雨淅沥自檐溜间下注于盆。及今思之，其艰辛之状，不禁为泪涔涔下也。

这幅动人的图景，对先生一生志学立德，无疑起了重要作用。据先生说，母爱于他是无微不至的，但幼小的他，如有过错，则“痛挾之”，亦决不姑息。先生纯谨厚重品行的养成，与母教之

严不无关系。

徐先生在育正小学，学习勤奋，品性纯良，有位叫江雨村的教师，十分器重和爱护他，便以侄女相许，订婚后，取名江聪，并搬到清节堂和徐母同住，平时做些针线活帮助家用。1923年先生在上海李国松家作教师，收入较丰，才把母亲从清节堂迁出来，成立了自己的家庭。江聪不辞辛劳，承担家务，与先生共同生活了五十年，使先生无后顾之忧，专心从事学术、教育工作，内助之功也是不可没灭的。

徐先生对育正小学的学习生活，怀有美好的回忆，认为它为社会造就了不少有用人才，他说：“即不肖今日之粗有树立者，不能不感谢先辈恩我之厚也。”育正小学在辛亥革命（1911年）那年停办了一段时间，先生转学尚志小学毕业。旋即考入皖省中学，因无力筹措学费，读了一年辍学，但仍坚持自学。1914年考入安庆第一师范学校，该校实行五年制，由于先生已读中学一年，考试成绩又很优异，便插入了三年级。该校教师胡远浚（字渊如），擅长桐城派古文，与桐城派最后一位巨子吴汝纶（挚甫）有交情，曾著《老子通义》、《庄子诠诂》二书行世；后来在南京中央大学哲学系任教。先生向他请教，并和一些同学醉心于桐城派古文学习。先生利用《康熙字典》作工具，阅读《古文辞类纂》和《经史百家杂钞》，逐步打下了牢固的国学基础。他对韩愈在《答李翊书》中说的：“惟陈言之务去”，领会很深，认为学问之道，后来居上，非创新便失去其存在的价值。1916年先生在安庆师范毕业后，留任附小教师。1918年又到庐江小学教了一段时间的书。接着考入武昌高等师范数理系，旋又休学；次年又考入南京河海工程学校，进校之后对围绕水利工程而讲授的各门自然科学，与平日爱好的文史之学的兴趣难以协调，思想陷于迷惘，这时忽得母亲生病的消息，遂请假归侍汤药，后来母病虽愈，但逾假已久，难以返校。经胡远浚的介绍，到桐城方守敬

家担任教师，主课是讲授《左传》。1922年又到上海李国松家任教师，也讲授《左传》，经反复研阅，深有心得，为先生后来研究先秦史能熟练自如地运用古史材料，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李家藏书丰富，还刻印书籍，除先生讲授“国学”外，还请有教师教读英语。因授课时间不多，故有闲暇自学，先生在李家三年半的时间中，举凡经、史、诸子、小学之书，无不择要披览，这就大大丰富了知识，开拓了视野。上海是人文荟萃之所，研究学问也往往得风气之先，这时他开始接触到金文和甲骨文。例如孙诒让的《名原》、《契文举例》、罗振玉的《殷文存》、《殷虚书契考释》等书，使他眼界一新，从而认识到掌握古文字知识是研究古代历史文化必不可少的工具。

徐先生在李家所得的聘金为每年六百元，在当时算得较为优厚的待遇，所以先生才有条件结婚并建立家庭。这时先生获知北京清华学校创办国学研究院的消息，就决定报考，想进一步叩开学术殿堂的大门。1925年清华国学研究院招收了第一届新生三十八名，先生以第五名被录取。

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宗旨是：“以现代科学方法研究中国古代文化遗产”，即所谓“整理国学”。该院聘请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李济等著名学者任导师、讲师，从1925到1928共办了四年。王国维讲授《古史新证》和《尚书》，梁启超讲授历史研究法，陈寅恪讲佛经翻译文学，赵元任讲语言学，李济讲人类学、考古学。先生对王国维、梁启超、李济讲授的课程都很感兴趣，特别是王国维讲古史，考证精审，见解新颖，更心领神会，增强了献身于这个研究方向的决心。先生因有家累，只学习一年，就提交了《从古书中推测之殷周民族》论文，提前毕业告归。1926年7月回安庆，旋赴合肥第六中学教书，半年后，受上海立达学园之聘，再次到上海。他在《立达》（季刊）第一期上发表了《古诗十九首考》，这篇文章引起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刘

大白的注意，1928年被聘为该系教授；不久，暨南大学中文系也聘请他担任教授。他在两校任教，约有两年之久。

1930年因陈寅恪的推荐，前往北平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专任编辑员，两年后升为研究员，中研院是1928年在广州创立的，次年5月迁至北平，由蔡元培任院长。该院史语所内设有四组，即史学与古籍校勘学；汉语、民族语言和普通语言学；考古学；人类学。陈寅恪任第一组组长。陈寅恪虽是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导师，当年因病未到，实际先生未受过他的教。陈寅恪也是看到《古诗十九首考》后才推荐他做编辑员的。史语所设在北海公园的静心斋，环境颇为优越，先生不放过有利条件，更加勤奋努力。他的史语所工作，历时八年，由于出色的科研成果不断涌现，获得学术界的称许，公认他已登上第一流学者的坛站。1931年他还在北京大学历史系兼课，十分关心学术人才的培养。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日寇侵逼，北方局势不稳。1933年春，史语所南迁上海，该所一组同人仍留下从事明清内阁大库档案的整理，先生不辞辛劳，做出了显著的成绩。1934年史语所由上海再迁南京，次年先生随一组前往，住北极山东麓。1937年7月抗日战争发生，史语所从南京迁至长沙，以后再迁昆明和四川南溪的李庄。先生在长沙会合了一家老小，并应中英庚款与四川大学的协聘，辞去史语所职务，到川大历史系任教，从此和四川结下了深缘。

当时先生来成都，川大校长是张颐，文学院长是朱光潜。先生所教的课程，是“殷周史料”。我是历史系四年级学生，选听了先生的这一门课程。1939年暑期，川大避日寇空袭迁往峨眉山麓。先生赁居峨眉县城水西门，从家里到伏虎寺上课，路程十余华里，往来步行；因工资收入微薄，不敷一家八口的用度，又兼任了武汉大学教授。武大在乐山，峨、乐两地相距七、八十华里，前往上课也要靠步行，生活清苦，可想而知。1943年川大迁

回成都，全校都集中在九眼桥侧。先生住留青院，屋边有些隙地，先生的母亲还率领孙辈种蔬菜，以节省开支。1945年抗战胜利不久，徐母因患肠癌不治，歿于12月15日。这对深怀母爱的先生实是一次沉重打击，在他这时所写的《先妣事略》中可以充分看到他的悲痛心情。

1946年秋，先生获得休假，去南京为中央大学教课。次年返校，川大史地系改为历史系，他担任了系主任。这一职务除短时间断外，长期一直由他担任。先生为人朴直真纯，屈己从人，团结同事，学生信赖，珍惜光阴，不喜社会应酬，以此教学事务虽繁，在科研方面仍不断多所收获。建国后，社会安定，前景光明，先生的思想感情趋于活跃，服务态度更加积极。1952年被任命为西南博物院院长，次年重任川大历史系主任，1956年经教育部审定为一级教授，次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稍后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还被推举为四川省历史学会会长，及先秦学会理事长等。先生为了尽其职责，不辜负党和人民给予的荣誉，遇事竭诚献议，知无不言。所遗憾的是，由极左风的掀起，发展到“十年动乱”的局面，他的忠耿正直反招来不断的冲击。1972年夫人江聪去世，劫难中顿失旧侣，哀痛可知。“四害”既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行了拨乱反正的政策，先生的名誉得到彻底恢复，他的青春活力重新焕发出来，全心扑在教学、科研工作上，数年之间，又取得一系列重大科研成果。“人间重晚晴！”先生通过艰难的一生，战斗到耄耋之年，目前虽卧病医院之中，但一座丰碑终于在人们心里建立起来。

二、科 研 成 就

徐中舒先生的一生是在科学研究和教书育人中度过的。他自

幼养成了勤劳俭朴、谦逊好学的习惯，早年读书就深得老师的赏识。在安庆师范学校，国文教师胡远浚对他很有影响，他从学习桐城派古文下功夫，逐步打下了国学的基础，对古代文学怀有特别的爱好。早年发表过《木兰歌再考》、《〈木兰歌再考〉补编》、《评〈中国文学变迁考〉》、《五言诗发生时期的讨论》和《古诗十九首考》等文，充分说明他当时兴趣之所在。先生两度担任家庭教师，都以《左传》作为讲授的主课，《左传》一书里有大量春秋以前的古史资料和传说，研习日久，自然对先秦历史的研究热情也增长起来了。由于先生对古文字学也十分爱好，通过自学，具有一定的素养，敏锐地看到古文字资料和古代史的密切关联性，认为两者互相补充、合作利用，会提高科学性，丰富内容，开拓意境。先生考入清华国学研究院后，亲聆王国维先生的讲课，受益良多，研究先秦古史的决心更加坚定下来。王国维所开《古史新证》一课，是把他所撰《殷卜辞所见先公先王考》《续考》、《殷周制度论》等论文加以增删而成；它考订精审，见解新颖，体现了王国维对殷周史的成熟论点，既根据文献材料，又用考古材料相印证，这种从“二重证据法”得出的论断，给予先生的印象最深，他后来研究古史不仅采用了这种方法，而且还把它大大发展了，就是尽量利用各门学科的科学知识，配合起来，围绕主体，进行深刻细致的论证；这样做，无疑会有助于体现历史本身的完整性，使理论基础更坚实，说服力更强，进一步提高了古史研究的科学性。先生笃于情感，他从王国维受学，虽只一年，但他得以跨入学术的门槛，饮水思源，是怀念不置的。他毕业不久，王国维投水自杀了。这一年（1927），先生写过《王静安先生传》、《王静安先生致死之原因》、《追忆王静安先生》、《王静安先生与古文字学》等好几篇文章。在我看来，先生对王国维所产生的悼念深情，可能也是对他自身的一种激励，他意识到他有责任把研究古史和古文字的火种接

来，传下去。

1930年先生供职史语所，所址在北海，据湖山胜景，环境清幽，图书琳琅，条件可谓优越，先生是从穷苦中走过来的，素性不好逸乐，不图享受，专心致志，搞好工作，于是仅仅几年，一系列重要成果就陆续发表出来，从此先生便以一个“学术水平很高的专家”（《古史辨》第一册16页顾颉刚语）在学术界显露头角。抗日战争爆发，先生怀着复兴民族及其文化的爱国热情，内迁四川，经历艰苦，讲学不辍，五十年光阴逝去了，却给我们创造出十分丰硕的成果。先生的科研成绩可分两大部分：一是史学，先秦史、明清史和四川史为其重点；二是古文字学。先生一生勤劳，精力集中，对文学、文字学都具有深厚精湛的素养，又能自如地运用考古学、民族学、社会学、文献学、工艺学诸多方面的知识，所以在研究问题进行必要的分析、比较、归纳、综合时，视野广阔，不囿一隅，古今通贯，得其肯綮。学术领域和自然界一样都有密切的整体性，是不能截然分割的。先生研究古史和古文字学有一大特色，就是把两者结合起来，互相印证；他利用古文字来作探索古史的工具，又以古代历史社会背景来阐明古文字的制作及其演变，既打通了捍隔，许多事实得以说明，新意也纷出了。以下简述先生的科研成就：

（一）史学 先秦史是先生的主攻方向。从他的著作目录中就可看到有四、五十篇（种）之多，学术价值很高。早期写的《殷周文化之蠡测》，打破学者把我国古代王朝视为同一个民族传统见解，指出殷周属于两个不同的民族，周人承受殷人文化，加以兴革，益得发展。殷、周在文字、生活习俗、器物形制方面大体相同，惟在姓氏、亲族及历法分旬上相异，而分旬之异并不是什么改正朔的问题，乃是民族习惯不同所致。《殷周之际史迹之检讨》一文，认为周自太王居岐山以后，即以经营南土为其一贯的国策。所谓文王受命之年，乃是周人国力膨胀已臻极限，舍伐纣而外，

实无他途，旧史所称文王积德行义之说，是不值一驳的。他为探索古代北方气候，作《殷人服象及象之南迁》，由象之逐步南移，证明我国大陆古今气候，实际发生了剧烈的变化，这一事实的指出和论证，无疑富有科学性。1931年先生在北京大学兼课，编写《商周史料考订大纲》作教材，为他此后建设殷周史科学奠定了初步基础。建国以来，他的殷周史研究成果仍然不断涌现。他写《黄河流域穴居考》，根据考古发掘，指出黄河流域一带有大批竖穴和窆穴，有的窆穴有脚窝可以上下，有的竖穴有台阶可以出入，他用古文字资料与上述情况相印证，说明殷人早期穴居，后来才有地面建筑的出现，这个变化乃是因为殷人与淮河流域的民族接触日益频繁受到他们使用地面建筑影响的结果。在《井田制度一文中，认为“田”的初义为田猎，为战阵，“田之所象，实与田猎之阵营相符”，“井田之形方，实由田猎社会演变而来”他对“爰田”作了新的探索 and 解释，认为“爰田”即是“交换其田”。殷周之际，荒土颇多，周人农业实行粗耕，地力既竭，便转而徙，其后空旷土地渐少，不能供给转徙之用，则须与他人换土易居，这就是爰田制的内涵。先生治学严谨不苟，解放后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它作为指导，对爰田制继续进行深入研究，期望获得更加满意的结果。

徐先生治殷周史，一贯对其社会经济给予高度重视。早年写的《耒耜考》，是受到国内外学术界赞誉的一篇重要论著。他以丰富的文献资料，结合古文字和文物资料，对耒和耜两种古代农具的形制进行了周密的考证，并说明后来耒、耜名称混淆的原因。他明白指出过：“虽是一两件农具的演进，有时影响所及，也足以改变社会的经济状况，解决历史上的困难问题。”说明当时他已深切理解生产工具对社会发展的重大作用。后来日本学者关野雄受其启发，写了《新耒耜考》直到1982年江西出版的《农业考古》还把它重新刊出。新中国建立，历史研究出现新局面。先

生为争取他的研究科学化，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进行了刻苦学习。由于有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指导，在短期内又迅速取得可喜的成绩。他的《论秦与匈奴的统一及其经济原因》，认为牛耕是秦始皇统一六国的经济基础，但秦的牛耕只限于关中一隅，未向各地推广，这是秦代国祚短促的重要原因之一。《论东亚大陆牛耕的起源》一文阐明春秋以前牛耕说不可信，牛耕乃始于战国时代的三晋，但尚未在民间推行，认为牛耕的普遍推行是从西汉时代赵过开始的。《论周代田制及其社会性质》一文，从田制入手对周代社会进行考察，认为当时是以三田制的爰田和年年耕种的井田为经济基础，有公田私田普遍存在，而且有一定比例，其生产者乃是家庭公社或乡村公社的成员，这种有一定比例的服役制，应为封建社会的劳役地租，后来废止公田而征收私田的什一生产税，也应属封建社会的实物地租。他由此得出周代是封建社会形态的结论。在《论西周是封建社会——兼论殷代社会性质》一文中，对殷周社会进行比较研究，明确论证两者性质不同，认为殷代是奴隶社会，从这个角度再次肯定周代属于封建社会。

徐先生治古史，并以考古学为工具，结合古史文献进行论证，增加了翔实可信的内容。以田野发掘为主的我国现代考古学产生于二十年代，先生首先注视和利用了这项发掘的新成果。他写的《再论小屯与仰韶》一文，依据当时发现的仰韶文化分布地区及其文化特征，认为颇与文献上记载的虞夏民族的活动范围相符，因此推测仰韶文化属于虞夏民族遗址。这一提议为我国史学界利用田野考古资料探索夏文化开创了一个新起点。建国以来考古发掘大有发展，使夏文化的探索工作又有了新收获，先生尊重事实，不胶执旧说，看法又有所改变，但创始之功是不可磨灭的。先生对古器物的研究作过大量的工作。关于这方面的论文，写有《论古铜器之鉴别》、《说尊彝》、《殷代铜器足征说兼论